

# 战略约束、规范扩散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张 凯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冷战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自身权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东盟规范的扩散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有赖于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国家良性互动与东盟规范的继续深化,而非美日联盟,亦非大国权力均势。

**[关键词]** 战略约束;规范外溢;东亚地区秩序;美国霸权;中美两权地缘均势;东盟

**[中图分类号]** D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2)01-0066-05

冷战结束之初,便有学者指出,从表面来看,目前东亚地区似乎相当和平,但是将要取代冷战框架的安全秩序仍不清晰。<sup>[1](P.34)</sup>甚至还有学者认为,由于东亚国家普遍缺乏欧洲意义上的民主以及政治经济相互依赖,因此,欧洲的过去会成为亚洲的未来。<sup>[2](P.7)</sup>然而,冷战结束后 20 年来,东亚并未退回到“欧洲的过去”,而是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本文将从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约束行为以及东盟规范扩散两个角度来分析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

## 一、关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几种论说

冷战结束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地区秩序,诸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寻求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

1、美国霸权说。美国霸权说的理论根源是霸权稳定论,该理论流派强调权力集中于一国有利

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在国内政治体系中公共产品是依靠中央政府供给的,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决定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缺乏稳定的实体。霸权国依靠超强的实力充当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角色,从而维持了自由开放的经济秩序和稳定持久的安全秩序。美国霸权说认为,冷战后美国依靠超强的经济实力、以美日联盟为核心的亚太同盟体系以及在东亚的前沿驻军等建构了美国的东亚霸权,这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sup>[3](P.52-55)</sup>

一方面,美国霸权说虽然看到了霸权国充当公共产品供给者角色的一面,但却忽视了霸权国滥用权力的一面。冷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并且在东北非地区动荡中也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这说明霸权同样可以导致地区秩序的破坏。另一方面,虽然有学者认为在东亚通过限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复兴,美日安全协定解决了地区安全困境。<sup>[4](P.155)</sup>然而,由于联盟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一面,使得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存在成为制约东亚地区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引发了人们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前景的担忧。<sup>[5](P.122)</sup>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成为阻碍地区合作、建构地区认同的严重障碍。

2、中美两极地缘均势说。体系层次的霸权结构并不必然导致在地区层次上形成霸权。与美国霸权说不同，罗伯特·罗斯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的中美苏战略三角结构被中美两极均势结构所取代。但与简单的两极均势不同，东亚地区的均势结构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特点，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具有主导地位，美国则在东亚海洋具有主导地位。由于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没有国家可以挑战中美两极结构，从而导致了地区秩序的稳定。东亚地区是否稳定将取决于中美两国渗透彼此影响范围的战略能力和意图。<sup>[6](P.84-92)</sup>为了维持东亚地区秩序的稳定，中国应恪守陆权大国的角色，避免挑战美国的海上优势地位。中国对海上现状的挑战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反应，这不仅会抵消中国的军力建设，而且会导致成本高昂的中美紧张。<sup>[7](P.73)</sup>由此可见，中美两极地缘均势说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即通过维持中国海军的弱势地位来确保东亚的地区秩序。

事实上，中国 18400 余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决定了中国地缘政治海洋属性的一面。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具备陆权大国的天然素质，同时具备海权大国的基本潜力。<sup>[8](P.1)</sup>由于海洋领土以及海洋权益争端的客观存在，中国安全威胁的海洋属性尤为明显。伴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循序渐进地发展海军，发挥海权大国的潜力乃为情理之事。另外，均势逻辑并不必然导致稳定。在均势的情况下，世界上的局部战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冷战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明证。<sup>[31](P.52)</sup>

3、功能说。功能说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以及主要单元之间的互动角度出发对冷战后的东亚地区秩序做出了新的解释。该论点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东亚之所以能够维持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安全秩序，主要是因为两个关键行为体美

国和中国为该地区提供了相应的公共产品，即美国给多数国家带来安全预期，而中国更多的是为地区国家带来经济收益。<sup>[9](P.25)</sup>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以及中国在安全领域消极回避所导致的这两项公共产品潜在的供给不足将成为东亚局势不稳的深层原因。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通过联盟体系向东亚国家提供安全预期，而日本则在雁行模式的引领下为东亚地区提供某种程度的经济收益。但是，这一时期安全预期与经济收益的美日供给模式并没有阻止越南推行霸权主义所导致的东南亚地区的动荡。因此，可以认为冷战后中美分别提供经济收益与安全预期公共产品的模式并非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

4、非均势核威慑说。有学者认为，冷战后东亚地区形成了非均势核威慑模式，这成为东亚和平的基础。在非均势状态下，核威慑双方的安全目标是不同的，双方都不追求对等安全。强势一方的安全目标是提升为绝对安全，而弱势一方的安全目标降为生存安全。<sup>[10](P.11)</sup>在这种目标逻辑下，非均势核威慑有利于维护东亚地区霸权国与核大国、强国之间以及强国与小国之间的和平关系。至于该地区小国之间以及小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则是通过东盟集体安全体制与韩国的和平统一政策两个补充变量来维持的。

从理论角度来讲，非均势核威慑说在衡量国家之间实力对比时没有将可衡量的经济实力囊括在内，也没有考虑国家的软实力因素，这样，冷战后东亚地区形成了非均势核威慑结构的判断便容易使人产生质疑。从经验角度来讲，冷战时期中苏之间也存在某种非均势核威慑结构，但是并没有阻止珍宝岛战役的爆发。

无论是权力视角还是功能视角都无法对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的维持做出有效解释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冷战后推动东亚地区秩序变迁的两大根本动力——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的忽视。

## 二、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约束及其作用

要想客观分析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不能忽视中国在崛起进程中的对外行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权力增长所带来的地区格局的变化而是中国权力运用的方式以及这种行为所导致的其他国家的反应。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约束行为及其所带来的区域国家良性互动是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

战略约束是指大国基于长远利益对权力行使所进行的限制。为了实现自身所设定的战略目标，大国往往会诉诸某些约束战略：开放自己、约束自己，对弱国和次要国家而言变得更具可预期性和可接近性。<sup>[11](P.155)</sup> 领导国为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战后秩序，往往会限制自身权力以换取小国对制度和规则的遵守；崛起国为了减轻他国对自身实力不断增长的担忧以顺利实现崛起，往往也会诉诸战略约束行为。

冷战后为降低实力不断增长给周边国家所带来的压力，中国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约束行为：第一，就全球层次而言，冷战结束之后，中国不断深化经济开放进程，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日益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经济上的开放性为他国获取绝对收益提供了机会，而中国对自由贸易原则的践行也表明了中国愿意按国际规则办事。第二，就地区层次而言，一方面，中国于2003年10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中国正式接受了东盟规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权力行使将受到这一法律文件的正式约束。另外，中国积极参与由东盟主导的多边框架（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3、东亚峰会、亚欧峰会等），这反映了中国愿意通过多边主义的方式增加其行为的可预期性，通过对东盟规范的遵守来限制其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中国不但加入到了现存的地区合作框架中来，而且还不断寻求创立新制度以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上海合作组织以及朝

核六方会谈的创立及其运行，中国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些新型地区合作框架为参与方提供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通过多边的互动形式可以预期彼此的政策取向，从而为决策制定提供了相应的信息。第三，就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而言，中国采取了明显的战略约束行为。中国与东亚诸多邻国存在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这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秩序的巨大隐患。崛起的中国将通过何种方式来解决这些争端无疑受到邻国的极大关注。中国并没有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实力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与邻国存在的领土争端。恰恰相反，中国主张以平等互利为原则，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正是在这一原则与方法的指导下，中国已与12个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的边界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的90%。<sup>[12](P.25)</sup> 至于领海争端，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便提出了“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sup>[13](P.49)</sup>的思想，此后逐渐形成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领海争端解决方针。另外，在谈判方式上，在1995年，中国改变了以往的政策，同意就南海问题与东盟进行集体谈判。<sup>[14](P.74)</sup> 经过反复磋商，中国与东盟于2002年11月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他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sup>[15]</sup> 这表明，在与周边国家的领海与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中国奉行了自我克制与战略约束的政策，从而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约束行为体现为通过塑造区域内国家间的良性互动来建构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首先，中国在由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过程中，通过逐渐融入国际社会，按国际规则行动来限制自身权力的运用，从而确保了体系层次霸权国美国的对华积极接触政策。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减轻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从而为东亚地区安全秩序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体系环境。其次，中国积极参加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多边实践表明，中国既没有主导地区观念框架的区域社会资本，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诉

求。相反，中国似乎在遵守着东南亚的软威权传统与东盟的共识外交方式。<sup>[16](P.156)</sup> 在多种场合，中国政府都表达了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主义进程中扮演领导者的立场。中国极富耐力地推进朝核六方会谈，并通过这一多边框架把东北亚邻国拉到同一谈判桌前，向朝鲜提供机会和提出要求。<sup>[17](P.154)</sup> 这一循序渐进的方式保持了国家间互动的持续，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回旋余地。中国积极加入以及创建地区制度的努力，表明中国遵守地区规范并把日益增长的权力镶嵌入地区多边框架的意愿，这有利于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承诺的信任，降低他们的疑虑。第三，在领海及海洋权益争端上中国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恪守以及对《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表明了中国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意愿。这使该地区大部分国家把中国看成是善意的邻国、建设性伙伴、仔细的倾听者以及不具有威胁性的大国。<sup>[18](P.64)</sup> 中国在领海争端上的自我克制行为有效避免了潜在冲突的爆发。

### 三、东盟规范扩散及其作用

冷战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是塑造东亚地区秩序的另外一个重要变量，而这一进程的核心则是东盟规范的扩散以及以其为核心的制度网络的不断扩展。东盟规范包括“硬规范”和“软规范”，前者主要体现在东盟成员国签署的正式法律文件中，后者则以处理彼此关系的“东盟方式”为表现形式。<sup>[14](P.35)</sup>

冷战之后，东盟积极寻求在东亚地区内推广东盟规范，并试图把大国拉入以东盟为核心的多边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东盟规范的扩散。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东盟组织的扩大与功能的扩展。冷战结束之后，东南亚大陆部分的国家相继加入东盟，从而使东盟组织在地缘上覆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同时，东盟的功能也在不断拓展，成员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强。东南亚大陆国家入盟意味着这些国家对东盟规范的普

遍接受和认同。二是，东盟积极寻求使东亚大国接受东盟规范。东盟正在运用在东南亚地区已证实相当成功的相同规范和价值观来社会化东亚地区。<sup>[19](P.432)</sup> 继中国与东盟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之后，印度、日本以及俄罗斯等国相继加入。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重返亚洲的旗帜下也于2009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标志着东盟推动大国接受东盟规范的战略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三是，以东盟规范为核心的地区多边框架的不断扩展。冷战后，围绕东盟规范而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东盟+3、东亚峰会等地区多边实践不断发展，在这些进程中东盟发挥着领导作用。对东南亚国家而言，通过东盟地区论坛或者东盟+3对外输出东盟规范的假定效用在于约束成员国以及大国的权力运用。而东亚国家对这些多边框架的参与则意味着与东盟规范处于社会化的互动进程之中。

自东盟成立以来，在东盟规范的约束下成员国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东盟规范的扩散也在显著地改变着东亚地区的政治生态，围绕东盟规范所展开的地区合作“可以增强地区内部的共同体感，降低紧张关系并且有利于稳定”。<sup>[20](P.261)</sup> 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东盟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整合结束了两极对抗的状态，东盟十国对外形成了一个整体组织，对内则培养了一种共同体感，这种内在的价值观促进了成员间的合作与共存。其次，东亚大国对东盟规范不同程度的接受，意味着这些国家在与东盟国家进行互动时将受到这些规范的约束。例如，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便对缓解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维护该地区的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基于中国对东盟规范的接受，双方形成了一种富有成效和持久的关系，这种关系正在逐渐消除基于普遍怀疑、沉痛的记忆以及反复紧张的历史。<sup>[18](P.76)</sup> 再次，围绕东盟规范开展的地区多边实践，将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囊括在内，这些多边实践为区内国家互动提供了平台，而多渠道的联系则提高了信息

供给的质量。以东盟规范为核心的地区多边实践进程不仅意味着互动的频度提高了,而且违背规范行事将意味着成本的提高。总之,东盟规范在地区整合、大国接受以及多边实践三个方面的扩散有效地型塑了冷战后的东亚地区秩序。

#### 四、小结

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是冷战后

东亚地区发展与转型的根本动力。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自身权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东盟规范的外溢则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未来东亚地区秩序的维持仍然需要依靠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国家良性互动与以东盟规范为核心的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前者可以降低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而后者则可以规范国家的行为,增强彼此的行为预期。

#### [参考文献]

- [ 1 ] Richard K.Betts.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3, Winter, 1993-1994.
- [ 2 ]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3, Winter, 1993-1994.
- [ 3 ] 汪新生,王春强.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冷战后东亚地区和平[J].东南亚研究, 2006(6).
- [ 4 ] G.John Ikenberr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A]. 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 Essays on American Power and World Politics [C].Malden: Polity Press, 2006.
- [ 5 ] 刘昌明.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困境与趋向[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1(1).
- [ 6 ]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Spring, 1999.
- [ 7 ] Robert S.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2, Fall, 2009.
- [ 8 ] 李义虎.从海陆二分到海陆统筹——对中国海陆关系的再审视[J].现代国际关系, 2007(8).
- [ 9 ] 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J].当代亚太, 2011(3).
- [ 10 ] 阎学通.东亚和平的基础[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3).
- [ 11 ] [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M].门洪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 12 ] 高飞.简评中国处理领土争端的原则及理念[J].外交评论, 2008(5).
- [ 13 ] 邓小平.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A].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 [ 14 ] 张云.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 15 ]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EB/OL].<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4553.htm>.
- [ 16 ] 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3, Winter, 2003/2004.
- [ 17 ] Julie Gilson. Strategic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33).
- [ 18 ]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3, Winter, 2004/2005.
- [ 19 ] Anthony Smith. ASEAN's Ninth Summit: Solidifying Regional Cohesion, Advancing External Linkages [J].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06(26).
- [ 20 ] Mari Pangestu. China's Economic Rise and the Response of ASEAN [A].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C].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c.2004.

(责任编辑 齐琳)